

西部资源富集区域 生态文明建设

评价研究

李瑞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部资源富集区域 生态文明建设

评价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部资源富集区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研究/李瑞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8

ISBN 978 - 7 - 5203 - 3216 - 3

I. ①西… II. ①李… III. ①区域生态环境—生态环境建设—
研究—青海 IV. ①X321. 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20438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刘晓红

责任校对 孙洪波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3.75

插 页 2

字 数 219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专著出版受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西部）：资源富集区域“生态文明”评价体系构建研究——以陕北国家级能源基地为例(14JC790006)、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陕北能源富集地区生态环境经济损失评估研究(13JZ022)以及2018西安财经学院基层学术组织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目 录

第一章 生态文明导论	1
第一节 生态文明的概念与界定	1
第二节 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和意义	2
第三节 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进展	6
第四节 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和任务	16
第二章 中国古典哲学与生态文明	20
第一节 中国古代生态思想的哲学基础	20
第二节 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中的生态思想	23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38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历史基础	38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理论探索	42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行动进展	47
第四节 “中国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制度建设	65
第四章 资源富集区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73
第一节 生态文明建设评价体系的构建	73
第二节 评价指标体系说明与数据来源	75
第三节 生态文明建设评价的数据处理技术方法	87

第五章 西部资源富集区生态、经济、社会现状研究	
——以陕北国家级能源基地为例	89
第一节 资源富集区的概念	89
第二节 资源富集区的自然生态状况	90
第三节 资源富集区的经济状况	94
第四节 资源富集区的社会状况	102
第五节 资源富集区的生态环境状况	107
第六章 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技术工具研究	112
第一节 指数与综合指数法	112
第二节 相对差距和法	113
第三节 TOPSIS 法	114
第四节 人工神经网络法	116
第五节 因子分析法	121
第六节 功效函数法	125
第七节 灰色层次分析法	126
第八节 灰色聚类法	135
第九节 灰色局势决策法	138
第十节 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标法	140
第十一节 主成分分析法	142
第十二节 蒙特卡罗模拟综合评价法	145
第十三节 模糊综合评价法	147
第十四节 德尔菲法	148
第七章 西部资源富集区生态文明建设评价实证研究	152
第一节 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152
第二节 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确定	157
第三节 基于指数与综合指数法的生态文明建设评价	160
第四节 基于功效函数法的生态文明建设评价	163
第五节 基于 TOPSIS 法的生态文明建设评价	165

第八章 生态文明研究的尝试与拓展	168
第一节 生态文明与生态价值量测度研究	168
第二节 城镇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研究	178
第九章 西部资源富集区生态文明建设政策与建议	187
第一节 政治领域	187
第二节 经济领域	188
第三节 社会领域	196
第四节 生态环境领域	197
第五节 其他领域	199
未来展望	201
参考文献	203

第一章 生态文明导论

第一节 生态文明的概念与界定

“生态”一词由德国生物学家 E. 海克尔（Ernst—Haeckel）于 1866 年首次提出，一般指地球上所有生物的生存状态，并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存在状态，也可以称其为自然生态。生态最初是从大自然的角度来理解的，随着人类的不断进化和社会的不断进步，生态的概念逐渐走入人类的生活，并且交集越来越大、交流越来越频繁，两者的关系也就日趋密切。人类社会在对生态的适应过程中，也渐渐改变着生态，一旦自然生态归入了人类可以改造的范围内，文明就产生了。“文明”一词，最早出自《易经》，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易·乾·文言》）。文明是历史的积淀、智慧的结晶，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成果。文明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作为精神文明的基本生存保障，而精神文明是物质文明的思想和制度保证，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本书所谈到的生态文明，是基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机结合的文明，并更加注重自然环境对人类生存生活的作用。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成果与精神成果的总和，它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能够互相和谐共生、保持良性循环、完成全面发展、进而持续繁荣的状态。^① 其实质就是在保持生态系统和谐、稳定发展的前提下发展人类物质与精神文明，不仅仅

^① 王续琨：《从生态文明研究到生态文明学》，《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 11 月 30 日。

做到两者兼顾，更要保证两者都能够良好并可持续发展。

新时代赋予了生态文明新的含义，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还加入了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因此，广义的生态文明基本涵盖了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范围内的所有方面，生态文明的构建需要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入手，既可以改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又可以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第二节 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和意义

一 生态文明的背景

工业革命之后，人类自此进入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时代。在近四百年的工业化进程中，虽然人类的社会生产能力得到全面提升，创造的社会财富远远超过过去几千年财富的总量，并且基本上实现了经济社会的重大转型，使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革。但由于人类不顾及环境的承载能力，在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不断无度地向大自然索取资源，并破坏环境，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生态危机。

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逐渐上升、臭氧层遭到破坏、酸雨状况频发、土壤沙漠化、有害物质污染、生物多样性锐减等问题凸显，使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由此绿色思想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1962年，美国著名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该书主要描述了在大量使用杀虫剂后，给人类与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生动地揭示了工业文明繁荣背后的隐忧，敲响了工业文明面临不可持续发展的警钟，也标志着人类已开始反思人与生态环境的矛盾。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科学家预言：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或许是继恐怖主义、霸权主义等之后21世纪人类面临的长期的最大敌人。

起初，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快速发展经济的时候，盲目地追求速度而没有考虑到保护环境的问题，致使环境污染恶化的程度逐渐加深，因而也形成了所谓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就我国而言，生态环境恶化也是我们正在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棘手问题。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

成绩：2010 年中国名义 GDP 总量超过 5.879 万亿美元，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5 年我国 GDP 达到 10.39 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超出世界第三、亚洲第二的日本 5.57 万亿美元。但我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生态环境也遭受了严重的破坏。据统计，当前中国国土有 1/3 被酸雨影响；滨海湿地损失面积占其总面积的 50%，约为 219 万公顷；有 25% 的人口使用不合格水源，七大江河水系中劣五类水质占 41%；有 1/3 的城市人口呼吸着被污染的空气；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 10 个城市中，中国占 5 个；森林覆盖率虽然逐年增加，但单位面积的蓄积量却在下降，生态功能较好的森林不足 30%；入侵的外来物种有 200 余种，全国大多数自然保护区都受到外来物种的入侵；农村和农业污染严重，食品安全问题时有发生……由此可见，虽然近年来我国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但资源日趋枯竭和环境污染加重的总体形势仍然很严峻，生态环境问题层出不穷，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内部压力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缓解。

因而，面对全球生态环境逐渐恶化的局势，保护自然资源，应对日益严重的环境破坏和生态危机，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共同的责任和义务。正如伯格特指出的：“相关整体论是我们在分析人类与自然的共同演化过程中必须坚持的原则，因为自然和社会和谐的再生产过程必须建立在人类社会共同的生态准则和集体利用自然和社会条件的基础之上。”世界各国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日趋注重生态环境保护与自然资源的合理有效的利用，生态文明逐渐成为各国衡量经济发展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在这种国际背景下，生态文明被逐渐提到各国经济社会建设的议程中来。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生态文明建设首次被写入其中；而党的十八大又把其提高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战略布局的高度，这体现了我国顺应人类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基本规律，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科学决策能力与决心。而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生态文明建设又进一步被升华，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

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被写进宪法中，再一次体现生态文明发展的重要性。

二 生态文明的意义

生态文明对人类社会来说，是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它伴随着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的快速发展，是对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超越。它的突出特点在于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发展。生态文明是人类自觉的选择，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进步。生态文明的建设是一项复杂的、全新的工程，包括人们追求和创造一切生态文明成果，也包含实现生态系统良性运作的一切行为，不仅需要坚实的理论与现实基础，也涉及方方面面的改进，需要不断进行创新，以应对不断发生的生态环境的破坏问题。地球是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家园，而自然资源又具有稀缺性，保护自然关系到人类自身的切实利益。因此，生态文明目前已经成为各国达成共识的主流文明形态之一。

（一）生态文明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已经涌现出许多灿烂的古代文明，无论是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玛雅文明和古印度文明等，都是在优良的自然环境基础上开花结果，进而推动人类经济社会的进步。然而这些灿烂的文明在人类过度开采自然资源、破坏环境的过程中，逐渐衰退甚至最终灭亡。

伟大的思想先驱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 19 世纪就已经敏锐地捕捉到生态问题对人类发展的影响，提出过“人与自然界和谐”的思想，同时提出实践活动是实现和谐的途径。

美国学者弗·卡特和汤姆·戴尔在他们合著的《表土与人类文明》一书中，从土壤的角度，研究了土壤与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通过考察 20 多个古代文明的兴衰过程，包括尼罗河谷、地中海地区、北非、西欧、印度河流域以及中华文明等，得出的结论是：所有文明衰败的地方，都是土地资源被过度利用的地方；人类进行战争的目的几乎都是争夺资源，人类所有环境的灾难几乎都是资源争夺的必然结果。

如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业文明的速度正在逐渐加快，然而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的恶化问题日益凸显，人类以破坏生态环境与肆意地开采自然资源为代价，换来的生产能力快速进步发展的结果，

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物质利益与享受的同时，也给其精神世界戴上了沉重的枷锁。

纵观整个人类史，人类进步的速度的确在不断加快，但这是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要使我们的地球家园能够永续发展下去，必须提高人类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否则生态失衡问题最终会阻碍人类进步的脚步。所以，倡导生态文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

生态文明是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是以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和谐进步、共同发展为核心的物质、精神的制度总和。生态文明是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剔除不利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部分，将与人类发展相适应的生态因素保存下来，从而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狭义的生态文明，就是单纯地表示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到什么程度。从广义上来讲，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

生态文明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是人类生活方式的完整统一，不仅包括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也包含精神世界的高度饱满。工业文明的发展，虽然加快了生产力进步的速度，使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但它走了一条与自然环境不相和谐统一的道路，致使生态环境失衡，引发了一系列的生态危机。生态文明就是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走上一条环境质量好、生产效益高、资源高效利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路径。

生态文明的根本要求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改变以往人类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使社会与经济得到发展的同时，自然环境也能得到有效的保护，使它们更好地造福于子孙后代，保障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三）生态文明是适应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必要条件

19世纪中叶，达尔文提出了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进化论，其主要观点是“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达尔文这一开创性的理论，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也同样适用。在原始文明中，人类利用简陋的石器、棍棒等生产工具，从事简单的劳作以满足自身生活的需要。但随着人类的发展，对物质的需求不断增加，原始的生产劳作已经无法满足人类对物质生活的需求，由此人类进入了以“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男耕女织”为基本特征的农业文明时期。18世纪中后期，英国工业革命后，

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作的工业文明迅速发展，大大提高了生产力的发展速度，由此工业文明影响全球。但是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经济发展在大幅提速的同时，生态环境恶化也接踵而至，这种以牺牲自然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发展，在满足人类物质需要的同时也破坏了生存环境。因而，生态文明的概念走入人类生活中。生态文明是对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但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的同时，一直忽略的问题是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也是生产力，良好的生态环境既能维护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能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人类永续存在的关键。所以，生态文明是能更好地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提供保障的新文明形式，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

第三节 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进展

从 18 世纪起，工业文明的兴起使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人类的生活得到极大改善，经济社会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但是随之而来出现的各种问题也日益凸显，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人类对自然越发无节制地肆意改造，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土地沙漠化等许多生态环境问题涌现，这是大自然对人类进行的一系列“报复”。生态环境问题逐渐从区域范围扩展成为全球化问题，从此学术界开始有意识地寻求不仅能够满足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能够保护资源环境的新发展模式。

一 国外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进展

1962 年，美国女生物学家卡逊发表了《寂静的春天》一书，书中运用自然界食物链系统的生态学原理，揭示了化学产品 DDT 农药在食物链系统中对于食品安全和生命健康的危害，深刻揭示了化学产品 DDT 农药不仅可以杀死害虫，而且也可以间接杀死以被化学产品 DDT 农药毒死的虫类为食物的鸟类，甚至由于该农药在农作物产品中的残留而危及人类的健康，甚至危及子孙后代。该书对传统理念“征服自然”提出了挑战，得到了伤害自然必然会危害人类自己的观点，从此拉开了人类走向生态文明的序幕，也标志着人类已经开始关注生态环境问题。1972 年，丹尼斯·L. 米都斯博士领导的 17 人小组耗资 25 万美元完成

了一篇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该报告认为地球是有限的，从而一切事物的增长也是有极限的，人们必须自觉地有节制地抑制增长，不然就会造成人类社会乃至地球系统的崩溃。这篇研究报告可以看作人类对今天这种不合理发展模式的首次反思，也为后来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奠定了基础。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最先是在 1972 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正式展开讨论。由此世界各国开始致力于界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目前已经出现的定义达到几百个之多，涵盖范围包括国际、区域、地方及特定界别的层面，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之一。1980 年国际自然保护同盟的《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提出：“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以确保全球的可持续发展。”1981 年，美国莱斯特·R. 布朗（Lester R. Brown）出版了著作《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提出以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和开发再生能源来实现可持续发展。1987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出版了名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该报告由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领导完成，她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被广泛接受并引用，这个定义系统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1992 年 6 月 14 日，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 世纪议程》等文件，是“世界范围内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是旨在鼓励发展的同时保护环境的全球可持续发展计划的行动蓝图。

赫尔曼·E. 戴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出版了《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一书，作者的主要观点是可持续发展的革命意义，强调增长不能盲目地寻求数量上的增加，更应该看重发展质量上的提高，而可持续发展就是一种保质保量的发展模式。传统发展观把经济发展作为一种孤立的系统，是可以无限制增长下去的，这种传统发展观显然是不正确的。戴利把经济看作生态系统的子系统，认为经济的发展是在生态发展的框架下进行的，不能脱离生态环境而独立存在。因此经济发展的能力是有限的，不能超越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过度利用资源，必须考虑到生态环境的因素制约。书中还指出，可持续发展包含生态、社会、经

济三方面的全面发展，只有将这三点充分地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洛杉矶时报》评论说：“这是一本由最超前的经济学家赫尔曼·E. 戴利撰写的新书。25年来，戴利一直在探索建立一种全新的经济学，用以诠释自然财富、共同体价值以及道德的必要性。”戴利在发表的《新生态经济：使环境保护有利可图的探索》一书中指出：地球生态系统是人类宝贵的财富，气候调节、水质净化等措施是维护其良好运作必不可少的服务。然而，它被破坏的速度为什么会如此迅速呢？他认为，人类的善良和政府的规章制度不足以起到拯救自然的作用。他介绍了一种新的概念——“新生态经济”作为保护生态环境强有力的知识工具，使经济与环境可以协调发展。

2001年11月，莱斯特·R. 布朗出版了《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他指出：经济学家只注重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而生态学家不仅能够看到经济成就，也看到经济发展给生态系统带来的沉重压力。于是呼吁经济学家与生态学家在经济理论与生态理论的共同指导下，构建有利于地球的新经济模式——生态经济。随后，在2003年，他又发表了《B模式：拯救地球延续文明》一书，作者采用大量数据对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不同发展模式展开研究，证明了人类未来的发展必须转向B模式，即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他指出，B模式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重构全球经济，使之能够支持；二是采取一切措施消除贫困、稳定人口，并且恢复希望，以吸引发展中国家的参加；三是通过先后有序的努力恢复自然界的各个系统。“B模式”是“生态经济”的进一步延续，布朗把“A模式”看成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模式，把“B模式”看作以人为本的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模式。他认为，人类应该立即行动起来，用生态发展模式逐渐取代单纯的经济发展模式，共同维护我们的地球家园。

二 国内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进展

(一) 古代生态文明思想萌芽

古代中华文明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传承，在这历史的长河中，涌现出了大量体现生态文明观念的理论。古人所提出的生态文明不是以建设生态文明为目标的，因为这个概念最早产生于西方工业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因此中国古人对人与自然的认识，体现出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辩证思想。虽然中国古代的生态文明思想并非针对现代工业化时代严重的环境

问题，但是其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论断对于现代人正确处理人、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中国儒家主张“天人合一”，其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具体表现为天与人和谐统一的关系上。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自然哲学的思想核心与精神实质。它指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在自然界中，天、地、人三者是相呼应的。《庄子·达生》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人与自然在形式上是一体的，不能将他们单独割裂开来，即自然的发展伴随着人的发展，反过来，人的发展也要顺应自然的发展，两者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天人合一”主张要以一颗仁爱的心对待人与自然界。

中国道家的著作《道德经·道经第二十五章》中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简单地说，就是人来源于大地，大地来源于宇宙，宇宙来源于一种发展规律，这种发展规律来源于自然。可以看出，万物的一切归根结底来源于自然。人类只有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以保护自然环境为一切行为活动的最基本条件，才能实现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

（二）当代生态文明的理论与应用学术研究

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分析，我国当代学者对“生态文明”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研究热点基本可以分为“可持续发展—增长方式转变—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生态文明”五个阶段，由理念到实践、由单一性向综合性转变的趋势十分明显。学术界首次明确“生态文明”的概念由叶谦吉教授提出来（1987）：“所谓生态文明就是人类既获利于自然，又还利于自然，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保护自然，人与自然之间保持和谐统一的关系。”徐春（2004）、张云飞（2006）、尹成勇（2006）、卓越等（2007）从时间角度对“生态文明”的内涵进行了界定；是丽娜等（2008）分析了“生态文明”的特征；严耕（2008）基于环境工程的视角分析了省际“生态文明”评价的理论体系；廖福霖（2012）归纳总结了“生态文明学”的科学理论体系；张健、谢瑞（2013）从理论视角探讨了城市“生态文明”的建设；刘某承（2014）基于生态足迹和区域生态系统服务ES的角度设计了“生态文明”的结构系统。

从应用研究的角度分析，我国学者以一般行政区划为对象进行应用

研究的主要包括：蒋小平（2008）对河南省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保护方面设计“生态文明”评价指标；宋马林（2008）从金融生态环境、科教、生态产业聚集、经济效率、节能等方面进行“生态文明”评价指标设计；曾钢（2009）以崇明岛、高洲（2010）以苏州市为例进行了生态文明评价的实践；严耕（2009）、吴明红（2012）和魏小双（2013）从环境工程的角度设计并改进了省域范围的生态文明评价体系。我国学者对典型性区域进行研究的主要包括：乔丽（2009）基于管理工程的视角，对平朔煤矿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方法进行了探讨；张青雨（2011）从环境工程的角度对我国西部地区“生态文明”评价方法展开了研究，并着重介绍了鄂尔多斯与乌兰察布市治污减排的特点；廖波（2013）对广西具有高污染特征的有色金属产业尝试进行了“生态文明”评价；邵忍丽（2013）首次将陕北地区作为对象开展“生态文明”研究，但仅局限于一般性政策建议，没有进行定量评价和实证检验。

当前学术界对“生态文明”的研究，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上丰富了其科学理论与方法体系。本书通过对“生态文明”领域研究现状的系统分析梳理，认为存在以下显著问题急需探讨：

- (1) 部分研究仅集中于哲学、政治学、生态学和环境工程的视角，开展对“生态文明”的一般理念与内涵的分析，或仅就行政区划展开一般性探讨，尚缺乏动态模型的构建；
- (2) 部分实证研究的指标体系明显是对可持续发展评价方法的简单压缩，其评价要素选择难以给政府的政策设计提供有力支撑；
- (3) 部分研究在评价指标权重确定上采用 AHP 法、Delphi 法、PSR 模型等方法，但数据加工受到方法与技术的限制，定量分析的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 (4) 以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资源富集区域作为样本，运用经济学的范式构建模型和评价体系，并在计量检验的基础之上，提出政策支持体系的研究相对薄弱。

（三）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研究

1994 年 3 月 25 日，中国国务院第十六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 21 世纪议程》，履行了中国政府对《21 世纪议程》等文件作出的庄严承诺，首次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